

B37.13

B 337.13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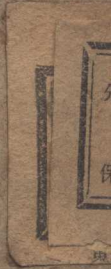
中蘇關係

科
著

229

中華書局印行

中





2980916

孫
科
著

中

蘇

關

係

中華書局印行



中蘇關係

目次

國父與蘇聯	一
中蘇外交關係	九
蘇聯的對外政策	二六
關於「蘇聯立國精神」答客問	三九
附錄	四九—六四

中蘇關係

國父與蘇聯

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在英文「自由中國」雜誌發表

一

國父畢生致力革命，其目的在救中國，同時在救世界。救中國祇是他的起點，救世界才是他的終極，他在彌留時給予蘇聯朋友的遺書，對於他一生的希望，表示得最爲明白。那極沉痛而又興奮的詞句，將永久的嵌在我們的腦海中。遺書上說：「你們是自由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之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留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下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通力合作，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歡迎強盛

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這封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國際遺書，真是前所沒有，爲人類指示出創造新世界的平坦大路。

救中國與救世界原是不可分的。中國之不自由不平等，是世界不自由不平等的一部分。人類五分之一的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要不獲致自由平等，世界上自無真的自由平等可言。而我們倘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同時自也須要求世界之自由平等。傳染到列國整個社會的帝國主義的疾病，是舊世界的一種如癩般的惡症。如果我們能醫治好這種病禍害，我們將爲人類造福不淺。

國父所以在長期的孤軍奮鬥中無時不企望新革命力量的興起，共同去打倒世界的不平。這個希望，直到他逝世前幾年，才從俄國爆發出來。那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

當時世界各國，正從帝國主義相互衝突的大戰中，停止下來，看見蘇聯革命成功「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并且要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大家於是都起了一種害怕蘇聯的心理，一齊聯合出兵去打蘇聯。所有關於蘇聯革命的紀載，無一不造作種種謠言，詆毀蘇聯，攻擊蘇聯。可以說全世界都反對蘇聯，要把這個新興的革命力量消滅。

然而，國父卻站在數十年不變的革命立場上，站在救中國救世界的仁者心地上，絲毫不爲那些虛偽欺騙的謠言所蔽，反而對它寄以無限的同情和希望。他說：「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空前未有。」又說：「世界列強所以詆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爲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爲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

壓迫……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自決，爲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打不平！」所以 國父認爲「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拿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合起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力量，便可以改造世界。

國父這個偉大的革命目的，不但在生前沒有達到，就是到如今也還是沒有完全達到。不過經十餘年的時候，我國已由對內統一，達到對外抗戰——民族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階段；蘇聯也由對共產主義退卻的新經濟政策，達到三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階段。可以說中蘇兩國都在努力向改造世界的目的前進。我們今後最大的任務，就是怎樣由抗戰建國中，實現 國父偉大的革命目的，完成三民主義，以強盛獨立的國家力量，與蘇聯攜手，並聯合其他的友邦，去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的最後勝利。這個責任，落在每個同志和同胞的身上。

二

國父逝世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蘇聯革命是一九一七年。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五年，不過七八年，那七八年中，蘇聯經過大戰的疲敝，又經過歷史上最大的流血革命，加以國內反革命派的搗亂，國外帝國主義武力的干涉與封鎖，弄到饑饉貧困流行全國，社會上很不安定，人民很受痛苦，建設固然談不到，就是連維持人民低度生活的物資都沒有。

當時橫在蘇聯革命政府面前的有三個大問題：在民族問題上，對內它要使國內一百數十種語言

文化各不相同的民族相安，對外要扶助被侵略壓迫的弱小民族謀求解放；在民權問題上，它要由沙皇專制政治，過渡到全民民主政治；在民生問題上，它要由貴族大地主的資本主義經濟，進步到人民共有共享的社會主義經濟。

這三個問題，世界各國，都還沒有解決，但是蘇聯卻在艱苦的環境中，經過二十多年革命的奮鬥，終於把它一一完滿地解決了。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國父不及親見，也料不到三民主義理想，竟然先在蘇聯實現。就是到現在，國內的智識界，還有不少不明白蘇聯建設成功，就是達到三民主義的理想。

蘇聯究竟是怎樣解決這三個問題，爲什麼說，他們解決了這三個問題，就是達到三民主義的理想呢？

就民族問題方面說，大家知道，蘇聯是多民族的國家，在帝俄時代，統治階級的俄羅斯貴族，對內厲行專制的統治，對外發展野蠻的侵略，民族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列寧斯大林早認定，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決，不但是世界革命的抱負無從進行，就是蘇聯的統一和建設也談不到，所以在建國開始的時候，蘇聯對內便極力推行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則，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聯合蘇聯境內各個不同的民族，建立共和國聯邦，根本消滅民族間的猜疑和歧視，同時對外推行濟弱扶傾的和平政策，予弱小民族以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

他們用來解決民族問題的原則是什麼呢？就是國父數十年前提倡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

義。我們知道，大凡結合多數民族來建國的國家，必須實行民族一律平等，然後才可以團結一致，對內統一，對外禦侮，成爲富強的國家。否則一到大難臨頭，彼此不能合作，一定要召亡國之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奧匈帝國的滅亡，最近波蘭的滅亡，原因雖然很多，但是國內各民族不能享受自由平等，權利，卻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民權問題方面說，蘇聯自一九三六年頒布斯大林憲法之後，在政制上，便成爲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在民權上，也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達到全民政治的境地。爲什麼蘇聯今日能成爲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實行全民政治，而歐洲其他國家，爭民權爭了二三十年，實行民主政治也實行了一百多年，結果反不能達到全民政治的地步，大家卻說它是虛偽的民主呢？簡單的說，就是因爲歐洲其他的國家，還是實行資本主義，弄到國內少數的有產階級，剝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而蘇聯則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根本消滅了階級，使人人經濟上的地位都得到平等。

因此蘇聯人民，現在不但是享有普通的間接民權，其在地方之各級議會中，且能事實上行使各種直接民權，達到民權主義所主張的直接民權的理想。除了這種純粹政治上的權利而外，更享有工作權，教育權和民族平等權，恰恰符合民族主義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屬精神。至就政府要有能方面說，則蘇聯政府之有能，是毫無疑義的。從他建國的過程中，從幾次的五年計劃底偉大成績上，都可以看出來。

就民生問題方面說，蘇聯在一九二八年把鼓勵世界革命的主張暫時放棄，用全部精神轉移到對

內建設，完成社會主義的生產工業化，使國家的力量增強，人民的生活完全解決。她用十年的功夫，集中全國的力量，完成兩個五年經濟計劃，第三個五年計劃也完成了一半，把資本主義國家要用百數十年的工夫才能完成的工業化縮短了好幾倍的時間。兩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基本重工業，大規模的電氣業，和與國防有關的種種工業都一一完成。現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就是注重輕工業消費工業上面，對於工業貨物和食用貨物的供應，都已大大的增加。

不但在生產方面有這樣突飛的進展，就是在分配方面，也完全得到合理的解決，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現象。所有基本工業的建設都由國家經營，生產工具完全國有，生產的目的在養民，不是為賺錢。個人收入分配也很平均，就是最多收入的和一般工人比較起來，也不過一與十五之比，完全達到社會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也就是民主主義的理想。

三

我們紀念 國父，就要努力完成 國父的遺志。尤其要慚愧，要省察，為什麼蘇聯以短短的一十幾年工夫，便居然達到了我們三民主義的理想，能夠負起救世界的一部份責任。而我們繼承着 國父遺給我們很完備的革命主義，很好的革命基礎，經過十五年的時間，還不能完全實現他的志願，不但是蹉跎歲月，而且使國家今天還在危難艱苦的境地！其惟一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對 國父的主義，還沒有澈底的認識清楚，對於國內外的情狀，中外的學理，還沒有完全的貫徹瞭

解，同時失去了的民族自信心，還沒有恢復過來。所以對於國父的主義，信仰不堅，奉行不力；總夢想世界上還有更新更好的主義；足以救中國救世界。殊不知國父的主義就是世界上最完備、最優美、最能實行的主義。我在上邊所舉的蘇聯實在情形，大家看了一定可以明白。我還要對大家說，就是將來世界各國的有識者，果真要追求人類真正的幸福，也祇有根據三民主義，謀求世界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整個完滿的解決，才有希望。

爲什麼我們還不能做到全體國人真正心口如一，表裏如一，絕對奉行國父的主義呢？這個原因，大約有兩方面，一面是由於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人，有些不明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爲何物，不明白蘇聯實在的情形，因而有反對三民主義的言論；一方面是由於信仰三民主義的人，也有些不明白民生主義爲何物，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和蘇聯的情形，沒有深刻的觀察和研究，因而常有反對蘇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言論。

其實共產主義祇是人類一種最高尚的理想，就是中國數千年前所講的大同。共產主義的目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到那時候，政府也用不着了。這個理想很高，以現在人類思想進步的情形看來，恐怕非千百年後不可。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最能夠接近這個理想的是蘇聯，中國將來實現三民主義之後，也是向這個理想前進。所以不但是民生主義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沒有衝突，就是與共產主義也沒有衝突。那麼，爲什麼又引起許多人的疑惑呢？爲什麼有些人要放棄民生主義，採取蘇聯的社會主義呢？其最大的毛病，就是因爲不清楚目的和方法，不明白每個社會都有各自不同的遞演歷

史，不明白對於不同的環境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的原故。

中蘇兩國的歷史與環境，互相不同的地方很多，最顯著的例如（一）蘇聯近百年來是一個完全主權的國家，沙皇未倒以前還是一個實行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中國則自鴉片戰爭之後，門戶洞開，受歐美各國物質與資本的剝削，淪為次殖民地，所以在蘇聯沒有對外爭求民族解放之必要，而中國最急要的革命要求，卻無過於民族的獨立與解放；（二）蘇聯在帝俄的時候，貧富階級已極懸殊，中國則無所謂大資產階級，祇有小貧大貧之別；所以蘇聯革命初期，不能不趨於極端，以暴烈的流血手段，剷除反革命的剝削階級、資本階級。而中國現在卻沒有階級戰爭之必要；（三）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較蘇聯落後，而蘇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尙且優容私有資本，在生產落後今日的中國，更不必馬上廢除私人資本，祇要加以節制，而以國家代表佔人口大多數的農工，依據完密的計劃，經營一切基本的有獨佔性的工業，以及私人能力所不能舉辦的大規模事業，便可以使私人資本消息於無形，這種方法上的不同，卻無礙於目的之相同，實在是殊途而同歸的。所以愈是羨慕蘇聯的人，愈應該確信 國父的三民主義，愈應該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愈應該研究蘇聯，和蘇聯攜手。

今天，凡是堅決抗戰，希望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人，必須在紀念 國父逝世中，根本剷除一切的疑惑，一切的妄想，一致全誠的信仰三民主義，澈底的實行三民主義，然後才能使中國成為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國家，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朝鮮台灣和一切環繞着太平洋上無時不受日本帝國主義威脅的被壓迫民族，創造新的世界，完成 國父救中國救世界的遺志。

中蘇外交關係

三十四年六月十二三日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外交組講演

我們要研究中蘇外交關係，首先應該研究蘇聯的對外政策，剛才聽說「蘇聯對外政策」一題已另由邵力子先生擔任講授，所以從略。中蘇的外交關係，大概可分為五個時期或階段，每個階段的延續為時約五六年。但在正常外交關係開始之前，却有一段革命道義的關係，為研究中蘇外交關係者所不可忽略遺忘的。

這一段革命道義的關係，是始於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大革命之後。俄國大革命發生，固然震驚了全世界，當時也為各國當局及帝國主義者所痛恨。但在一九一八年即民國七年間，總理從廣州回上海後，首先對俄國大革命表示同情的慶賀。總理當時曾致電俄國大革命領袖列寧先生，慶祝俄國革命的偉大成功。這件在中蘇外交史上重要的文獻，現尚存在莫斯科列寧博物館。同時在辛亥革命成功，國父創建民國的時候，當時俄國革命運動尚未成功，列寧先生以革命黨的身份在其秘密的革命刊物，即現在的「真理報」發表文章，讚揚中國的革命，對總理尤表欽敬。認為中國革命當時雖以民族主義為主導，但是總理所領導的革命，除民族主義外，還包含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要以人民為國家的主人翁，並要求提高人民的生活。這文件現在也存在列寧博物館裏面。這足以證明在中蘇外交關係開始之前，已先有一段革命道義的關係，為中蘇正常外交關係立下良好的基

礎。

第一時期——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爲親密提攜階段

第一時期，自一九二三年蘇聯改組成立後，中蘇正常外交關係即隨之開始。民國十三年北京政府與蘇聯大使加拉罕在北京成立北京協定，蘇聯自動放棄帝俄時代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的特權：如天津漢口的俄國租界，領事裁判權，航海通商等不平等的權利，同時承認了外蒙古屬於中華民國，當時因爲張作霖在奉天不尊重北京政府，故加拉罕另與張作霖訂一奉天協定。其內容除規定東北地方與蘇聯的關係外，餘與北京協定大致相同。蘇聯當時雖一面與北京政府發生正常的外交關係，但深知當時北京軍閥政府不能領導整個中國，認爲中國將來的力量，一定屬於南方的革命政府，所以在加拉罕未到北京之前，他們已另派一位黨代表名叫馬林的到廣州桂林，晉謁總理，商談中國的革命問題。馬林表示蘇聯願意援助中國革命。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叛變，總理於蒙難後離廣州赴上海，那年秋冬之間，蘇聯復派重要特使，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越飛至上海與總理接洽，商討中國革命問題，結果發表了共同宣言。蘇聯承認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方法尤不能試行於中國。承認中國在國民革命階段上，只有實行三民主義，所以蘇聯自始即表示贊成中國革命以三民主義爲領導原則，並願意援助中國三民主義革命建國的成功。十二年春天，總理重返廣州。總理預備進行黨的改組，乃聘鮑羅廷爲政治顧問，鮑氏於十

二年春夏間到廣州，總理派定同志若干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研究改組本黨各項有關的事宜，並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果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總理領導之下於十三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產生了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確立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度。從民國十一年到十六年，這五六年間，中國革命得到蘇聯的寶貴援助，可以說是中蘇提攜最親密的時期，雙方關係的友好爲前後所僅見，不但黨的改組，得到蘇聯顧問的贊助，就是建立黨軍也同樣會經得到蘇聯軍事上的援助。蘇聯當時派有參謀團到廣州，由加倫將軍率領——加倫將軍原名布魯齊爾，到中國時乃化名加倫。在加倫將軍之前，尙有巴夫羅夫將軍來粵，巴夫羅夫將軍跟隨總理到東江督師，清勦陳炯明的餘孽，到石龍行營時偶因失足致墜水死。總理派令總裁蔣先生擔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黃埔軍校創立之時，深得蘇聯的援助，學生所用槍械，大部由蘇聯接濟，從海參威派船運送到黃埔。其後黃埔學生軍平定商團之亂，和東征北伐各役，均獲成功。

中蘇外交關係，在此時期，實不限於普通的外交關係，普通的外交關係在那時，蘇聯是以北京政府爲對手，但是中蘇良好的革命外交關係，則建立在其與廣州的革命政府的關係上面。從黨的改組，黨軍的建立，乃至北伐至長江，都得力於此種良好的關係。但在此期之後半期，從總理逝世後即開始發生暗影。這種不幸的暗影是由於內部問題不能解決，共產黨自十三年加入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後，在北伐進展到長江一帶的時候，主張農民武裝暴動，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國共之間的裂痕至此乃無法彌縫，而演爲清共之役，結果國共兩黨分家後，十六年冬共產黨即在廣州暴動，事平後

本黨中央在上海舉行臨時會議，決議與蘇聯絕交。當時國民政府在南京，由外交部長伍廷芳先生通知蘇方，斷絕外交關係。自此以後，中蘇外交關係，由親密時期竟轉入惡化時期。

第二時期——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爲惡化絕交階段

第二時期，自民國十六年春夏間至二十一年秋。在此時期，中蘇兩國間可說已沒有外交關係。蘇聯在中國的使領館，軍事參謀團，黨的顧問，均相繼離開中國。

至十八年秋冬，且有過一段中蘇軍隊武裝衝突事件。這就是起於東北地方長官張學良誤聽宵小的播弄，用武力行動企圖從蘇聯方面搶佔中東鐵路的事件。衝突結果，張學良的東北軍吃了一個大虧，被蘇軍打敗，不得不停戰媾和以爲了事。

此是中蘇關係惡化，雙方誤會最深的時候。這是很可惜的，因爲中蘇兩國在此時期不但失掉很好的合作機會，而且種下不幸的惡因；民國十六年，在中蘇絕交以後四年，即發生「九一八」之瀋陽事變，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中國，佔領東北。我們回溯此段不幸歷史，覺得假使當時中蘇關係不惡化，十六年沒有反共絕蘇的事件，兩國能維持友好的革命外交關係，以蘇聯爲與國，也許敵人對我不敢發動侵略。因爲敵人知道中國已與其革命過程中的惟一與國斷絕關係，乃胆敢肆其侵略的野心。在「九一八」以前數年間，蘇聯方面曾有一間接表示，願仍與中國提攜，認中蘇關係惡化，是受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的影響，不應因此而牽累中蘇兩國的邦交。爲甚麼蘇聯有此種表示呢？這是因

爲根據蘇聯的看法，日本是要發動侵略的。但先侵略西伯利亞，或者先侵略中國北部，當時不易判斷。但是無論如何，日本侵略的威脅對中蘇兩國是共同的，當時蘇聯國防建設尙未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在進行中，重工業的基礎，尙待奠定，日本很可能先向西伯利亞發動侵略，故仍希望兩國能互相提攜。但或因當時我們對蘇聯理解，尙未盡正確，以致錯失機會。「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看日本於侵略東北後，是否將按兵不動，抑或急轉直下，轉向西伯利亞侵略，尙未敢判斷，頗存戒懼之念，認爲如果一任日本在東北建立重工業中心，其第二步當可能侵略蘇聯，因此認爲日本侵略蘇聯的威脅不但未減少而且增加。蘇聯因此對中國希望很切，希望中國諒解，而蘇聯亦承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在國民黨不在共產黨，中國不可因清共而絕蘇。由於蘇聯這種政策，及國際客觀的情勢，中蘇關係乃醞釀轉變，此醞釀時期約有一年之久。

第三時期——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爲復交平談問題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秋天，東北失掉一年以後，政府始決定與蘇聯復交。當時係由中國駐德大使顏惠慶乘在日內瓦國聯開會之機會，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簽訂復交宣言。該宣言內容簡單，只聲明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互派使節。從那時起，顏惠慶即奉命調任駐莫斯科大使。蘇聯亦派鮑格莫洛夫爲駐南京首任大使。他的使命希望先與外交部交涉，訂立商約。當時汪精衛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他與鮑大使談判商約，故意提出種種困難問題，要與蘇聯算舊帳，要求蘇聯賠償革

命時期所沒收的華僑財產。但是究竟華僑當時所受的損失多少，我們自己亦無正確調查。即使有調查，亦非蘇聯所能承認，因為蘇聯大革命後，把各國在蘇聯的私有財產統收歸公有，單是法國一國就有幾十萬萬佛郎的債務被革命政府所否認。蘇聯革命後的政策是化私爲公，無論是俄國大地主的財產，英美商人的財產，概予沒收，如果要一一賠償，那便與蘇聯政府的革命政策相違背，蘇聯當然不能答允。當時法英美及歐洲其他國家，與蘇聯交涉都沒有達到這樣的要求。汪精衛復提出中蘇貿易的手續，要求蘇聯同意，中國對蘇聯的貿易，完全經由中國政府特設的對蘇貿易的主管機關辦理，蘇聯不得與中國商人直接買賣，蘇聯的商品只能賣給中國國營貿易機關承銷。蘇聯方面對於此種要求很覺可怪，爲甚麼中國對蘇聯貿易要採取國營辦法，對日本及英美各國則不然呢？蘇聯認爲如果中國對外貿易全部改採國營政策，對世界各國一律待遇，則蘇聯當無用其反對，但如係單獨以之對付蘇聯，即認爲不平等的待遇。當時實業部長是陳公博，陳自以爲聰明，謂蘇聯對外貿易既係國營，則中國對蘇聯貿易當亦應採國營辦法。殊不知蘇聯對英美貿易係採國營，但英美對蘇聯貿易則仍係採自由辦法。鮑大使對外交部當時提出的要求，不予以答應，商談三年多，無何結果。中蘇關係陷於若有若無不即不離的平淡狀態中。

在此時期還有一事，足以加深中蘇關係之隔閡的，便是蘇聯政府把中蘇合營的「中東鐵路」（日人稱爲北滿鐵路），於民國二十四年春（一九三五年）與倭僞方面協議，出賣於僞滿洲國。我國對此，認係蘇聯方面破壞中蘇合營該路之條約規定，曾向蘇方提出強烈的抗議，但事已做成，終